

韩国国家建设初探:对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认识

□ 许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二战后韩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建立现代化国家,主要包括民族统一与主权独立、工业化和民主化三个方面。这一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李承晚-张勉不成功的国家初建、朴正熙用威权推动工业化的“国家重建”、全斗焕-卢泰愚的民主化转型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建国”。本文有三点新认识:不完整的国家建设限定了韩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发展是由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民主建设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与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密切相关。

[关键词] 韩国国家建设;战后韩国;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5.032

[中图分类号] F131.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号] 1004-0544(2017)05-0182-07

当前学界对二战后韩国历史的诠释主要是用现代化范式。该范式预设今天的韩国为现代化的目标,战后韩国的历史进程就是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这种诠释的优点是可以清楚地把握韩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征,而缺陷在于它用结果来解释过程、用价值来评判存在^①,这就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现代因素”会造成社会混乱,而一些“反现代因素”却推动社会发展?鉴于此,本文考虑用“国家建设”这一学术概念,重新认识战后韩国历史。国家建设,简单地说就是指政权的建立与治理^②。据此界定,国家建设的主要实施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但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过程,它绝不是统治精英单方面选择的,而是由所处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用“国家建设”替代“现代化”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韩国发展模式被称为是国家主导

型,“国家建设”更能反映出韩国历史的这一特色;第二,“国家建设”更为客观中立,不像“现代化”那样带有目标性和价值色彩。因而从国家建设的视角研究战后韩国史,必定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1 依附美国:国家分裂、经济畸形与民主失效

1945 年,朝鲜半岛摆脱殖民统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建立起现代意义国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家统一、有效的民主政府和健全的国民经济。然而,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把国家初建的重任完全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与援助,结果并不符合国情,将韩国带入民族分裂、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的境地。

1.1 民族分裂是韩国国家建设的最大失败

同其他国家不同,朝鲜半岛的独立并不是靠自身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家理论与韩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

作者简介:许亮(1981-),男,山东潍坊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色彩的学术概念。现代化的本质是进步,但不是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可称为现代化,而是专指从 16 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取得的进步成就,如中央集权化、国家民族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市民化、知识科学化和文化开放化等。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开创者和标准制定者,亚非拉国家是追随者和学习者。因而,用现代化来诠释韩国历史,很容易会犯这样的毛病,即用西方价值或现代价值来决定历史存在的合理与否。

“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与“民族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国家的政治功能,后者更强调国家的民族身份。其实,韩国很早就用“国家建设”来描述战后历史使命,比如朴正熙在 1962 年出版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中就使用了“国家重建”的表述。虽然在英文版中的用词是 nation-rebuilding,但书中含义更接近于 state-rebuilding。

抗争取得的,而是由美苏大国“解放”的。建国的事情就掌握在美苏手中。早在日本投降前,美苏已达成一致:让朝鲜独立,建立统一政府,但认为朝鲜人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先由美苏托管“相当时期”。然而,随着美苏分裂,南北统一变得难以实现。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转而扶持南方单独建国。

同时,南朝鲜内部政治势力的分裂助推了国家的分裂。光复之后,国内形成左右分野的政治格局。左翼力量以共产党、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一直积极从事抗日独立斗争。而右翼力量主要以地主阶级和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过的朝鲜人为主。日本投降后,右翼担心左翼掌权后会遭到清算,拒绝与之组建联合政府,并依靠美国,打压左派。1946年,以李承晚为首的极右翼势力,主动要求在南方单独建立政府,并赴美寻求支持。1948年,李承晚建立大韩民国政府,朝鲜半岛正式分裂。

美国和南朝鲜右翼势力为了自己利益单方面建国的做法,违背了民族统一的愿望,遭到左翼和中右翼的反对,更在济州岛爆发了反分裂的武装起义。不过,李承晚并不是放弃统一。他是想先建立政权,然后以武力方式吞并北方。同时,北方的金日成也寄希望用战争统一南方。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频繁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了战争的全面爆发。严格来说,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外国本无权干涉^[1745-769]。美国却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公然入侵朝鲜,将一场内战变成国际战争。战争给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创伤,也让国家分裂永久固化。美苏冷战虽是半岛分裂的主要原因,但从韩国自身看,左右翼分裂和李承晚的建国路线才是“主体原因”^{[2]183}。

1.2 经济政策不切实际,严重依赖美国援助

韩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要发展民族工业,必须先要进行土地改革,清除地主阶级障碍。但是李承晚一开始就是在地主阶级支持下登上总统宝座的,对于土地改革自然是偏袒地主。反而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人民军在韩国进行了彻底的农地改革。李承晚回来后,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勉强维持农地改革结果。农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很快就恢复到战前水平。

农地改革只是工业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之一,还需要引导地主资本投向民族工业。李承晚政府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韩国的民族工业主要还是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在处置这些“归属财产”时,政府与亲日派分子勾结,优先让那些曾帮助日本殖民者经营管理企业的韩国人获得。这些企业发展成为“财阀”,是右翼独

裁统治的经济基础。韩国资本主义直接进入财阀垄断阶段,自然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在产业政策上,李承晚一心想着赶超朝鲜,不切实际地大举发展重工业,实际效果并不好。要不是有美国的援助和扶持,韩国经济几近崩溃。

1945-1960年美国总共向韩国提供了27.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54-1960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总投资的50%和财政收入的38%都来自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援助。美国的援助也不是白给的,它是以购买美国农产品为条件的。美国农产品价格低廉,但只被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掌握,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而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则处境艰难。韩国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型经济。

1.3 民主失效,政治混乱

美军占领南朝鲜后,直接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移植过来,很快就出现“水土不服”。李承晚为了保住总统大位,绞尽脑汁操纵选举。1952年,他动用军警强行通过《拔萃改宪案》,确保自己二次当选;1954年,将原本未达到法定票数的宪法修正案以“四舍五入”的理由强行宣布通过,扫清三次当选的障碍;1960年,李承晚再次以舞弊手段第四次当选总统时,人民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四月革命”运动,李承晚在人民的抗议浪潮下被迫辞职。以张勉为首的反对派——民主党趁势赢得大选,但是很快民主党内部就因权力分配不均、人事安排矛盾而分裂。张勉政府沦为弱势政府,难有作为。比如,张勉上台之初就把发展经济确立为“第一”国策,并制定了1961-1965年经济发展计划,但受党派斗争影响,一系列经济政策迟迟不能落实。更为严重的是,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部势力不断膨胀。李承晚凭借个人威信和政治手腕尚能有所节制,而张勉政府已经难以掌控军部。结果不到一年,张勉政府就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所终结。

民主失效可能是韩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难理解的地方。为什么早早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形同虚设?这里归结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韩国还不具备支撑起民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韩国的民主是直接西方移植过来的,它不具备西方国家的民主基础——资本主义工业充分发展和市民阶层崛起。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传统社会,农民占绝对多数;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薄弱;财阀控制着国家的财富,与掌权者结成同盟。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后,反共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左翼力

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禁声, 难对掌权的右翼保守派形成制约。这些都不利于民主的培养。

第二, 西方民主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注重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政治精英以为将形式和程序移植过来, 韩国自然就会实现民主。殊不知西方的民主形式要有国家权威做后盾。西方国家(除美国外)在实现民主之前都经历过国家主义的长期发展。没有国家权威的保障, 民主只会流于形式。张勉政权就是如此。西方的民主程序也很容易出现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情况, 造成“民主赤字”^①或政治僵局。50年代韩国的政治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此。保守派要么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 要么因党派利益冲突, 致使政府毫无作为。其实, 西方国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培养起妥协精神、游说集团等非制度性因素, 以克服民主的缺陷。但这些只能慢慢培养, 而不能照搬照抄。

2 “重建国家”: 威权政治+工业化

朴正熙上台后提出“重建国家”的口号, 确立“先建设, 后统一”的方针, 将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巩固自己威权统治和推动工业化两方面。韩国历史进入所谓“开发独裁”时代。经济上的现代化与政治上的逆现代化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2.1 为什么在已有民主基础的情况下韩国的威权主义依然能够长期掌权

第一, 需要澄清现代政治的要件。通常有一种习惯性观念, 认为现代政治就等同于民主政治。其实不然, 民主只是现代政治的要件之一, 权威同样必不可少, 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3]16}。反观韩国, 在引进民主的形式后却未形成民主的权威。国家软弱, 政局混乱。朴正熙就公开主张: 民主并不适合韩国现在的国情^{[4]153-155}。韩国要建立“行政民主”制, 其实就是要加强国家权威。

第二, 韩国的社会结构是威权主义长期掌权的基础。(1)威权主义势力同农民联合。虽然60-70年代韩国城市化进程很快, 但农民仍然占多数。城市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 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是反政府的主力。而农村地区政治上相对保守。朴正熙的军人集团大多出身农村, 很容易获得农民的认同。军农联合有助于遏制城市的反抗^{[5]58}。(2)威权主义势力同财

阀结盟。朴正熙上台后, 大力扶持财阀企业。不仅在贷款和项目上偏向大企业, 而且在劳资矛盾中偏袒资方。反之, 财阀也对威权主义政权予以坚定的支持, 同政府关系越密切, 对自身越有利。金钱政治是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

第三, 军人掌权在推动现代化进程方面有一定优势。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 军队常常扮演改革先锋的角色。因为军人比中产阶级有更深的民族主义情绪, 比农民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当利益诉求无法满足时, 他们就会以军人的方式接管政权, 以军人的作风推动改革。在韩国, 军人干政更为有利。一方面, 朝鲜战争后, 韩国军事化倾向严重, 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 政府对军部控制有限, 军部工作与驻韩美军交往较多, 反而受政府影响较小。

第四, 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也是军人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根据美韩达成的协议, 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由驻韩美军司令控制。因此, 很多人怀疑, 朴正熙(以及后来的全斗焕)能够调动军队发动政变是得到了美方的默许^{[6]222-224}。而美国出于拉拢韩国支持越战的需求, 对韩国军人政府破坏民主、侵犯人权的行径往往是态度暧昧。

2.2 朴正熙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维持统治的重要资本

1961-1979年间, 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被誉为“汉江奇迹”。为什么一个威权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比民主政府做得还好?

要理解此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的著作对韩国经济决策层影响非常大。1961年朴正熙访美时还单独拜会过他。罗斯托认为, 传统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就必须做好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准备^{[7]17-31}。政治方面要有新精英阶层取代传统地主阶层掌权, 并且新权威应具有民族主义情怀和致力于现代化的使命感。朴正熙上台时, 罗斯托就乐观预计: 年轻能干而又有野心的人掌权, 韩国经济起飞指日可待。

朴正熙在经济方面做的准备包括: 一是解决粮食问题。这是传统农业国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先决条件。早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农业生产率就有大幅提

民主赤字就是指通过民主程序获得的结果并不是民意所想要的。比如, 1949年韩国政府制定的农地改革案, 因为触及到地主的利益, 而被国会中占多数的地主代表议员所否决。

高。此外,韩国还能从美国获得大量粮食援助。这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粮价和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有利于韩国节省外汇,降低消费性支出和增加生产性投入。二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的特点,而且容易受到利益团体的羁绊。这时候就显出了威权主义政府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在国家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建设京釜高速公路,为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三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奉行“出口第一主义”。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低级劳动力成本,再加上自身市场狭小,只有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实现工业起飞的资本积累。为此,韩国政府采取补贴、退税、建立工业园区等多种政策扶持出口产业。

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步入起飞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理论,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主要发展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到了起飞阶段就要以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为主。这是工业化的关键转型。韩国再次显示出威权主义的优势。当1973年朴正熙发表《重化学工业宣言》时,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并不看好,韩国经济企划院也持反对立场。但朴正熙意志坚决,专门设立直属总统的重化学工业企划团进行规划。朴泰俊、郑周永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怀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也适时出现在这一历史关口。在政府的扶持下,浦项钢铁厂、蔚山造船厂、龟尾电子工业园、丽川石化工业园等迅速建成。1962年时轻工业占到工业增加值的74.9%,而到1979年重化工业达到55.3%。

2.3 外部因素也是韩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一,美国因素。美国军事援助和驻韩美军承担了韩国大部分的防务开支,韩国得以节省资金,专心发展经济。美国还提高对韩国的援助贷款,并且派专家指导韩国经济发展计划。目的就是想把韩国经济搞上去,使其成为第三世界中的资本主义样板。

第二,日本因素。朴正熙上台后,不顾国内反对,强行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向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日本企业也随之大举投资韩国。到70年代,日本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贷款供应国,为韩国经济起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第三,越战因素。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后,韩国成为派兵最积极的盟国。作为条件,美国承担韩国军队的一切费用以及韩国企业优先获得物资供应和工程建设方

面的项目。越战特需成为60年代拉动韩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动力。总之,冷战虽然将韩国置于不利的安全环境中,但也给韩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8]22-35}。

当然,韩国这种“威权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一是民主主义遭到压迫。朴正熙上台后,对民主人士采取高压措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二是政府权力过大,寻租腐败盛行。这是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顽疾。政府在引导资本投向的同时,也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虽然朴正熙本人非常廉洁,但这改变不了体制性的腐败。特别是财阀企业,凭借深厚的政商人脉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韩国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但工人的境遇却未有明显改善。低工资、高强度、长时间和恶劣环境,让工人难以承受,罢工抗议此起彼伏。1979年,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朴正熙集团发生内讧,朴正熙被刺身亡。

3 政治转型:曲折的民主化之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国家建设的主题转向民主政治。与推动工业化时的积极主动态度不同,保守政治精英在政治民主化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最终是在反对派和市民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让步。

朴正熙被刺后,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力量趁机发动政变,重新建起威权统治。这说明80年代初韩国民主变革的时机还未成熟。一是威权主义力量仍然强大。朴正熙被刺具有偶然性,军人、财阀和官僚结成的权力联盟并未改变。二是民主力量仍然弱小。虽然全斗焕的军事戒严遭到了民主力量的激烈反对,甚至发生了光州事件这样的流血冲突,但是民主运动的主力仍然是以学生运动为主,工人阶级和城市阶层并未参与进去。三是中产阶级相对保守。中产阶级本是民主运动的主力,但是韩国的中产阶级很多都是威权体制的受益者,因此政治倾向相对保守。四是美国态度暧昧。同朴正熙政变一样,全斗焕调动军队发动政变和镇压光州,也未遭到驻韩美军的阻止。而且全斗焕很快就收到访美的邀请,这也被视为华盛顿对全政权的认可。

1986-1987年间,随着新一届总统大选的来临,民主化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全斗焕也曾试图延续自己的统治。但这次威权主义已经无法招架民主力量的反扑。迫于压力,军部势力新代表卢泰愚发表了“民主化宣言”。韩国民主化取得重大突破。80年代韩国民主转型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韩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80

年代韩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81-1990年间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其中1986-1988三年更是高达12%。其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占到近40%，而农业下降到10%左右。支撑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已彻底被工业经济所取代。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亨廷顿曾提出“经济过渡带”理论，即处于经济过渡带的国家最容易实现民主化，80年代的经济过渡带是人均国民收入1000-3000美元之间^[97]。而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1978年是1211美元，到1987年增加到3013美元，正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人口一直呈负增长的态势，到1984年工业就业人数超过农业就业人数，1990年前者已是后者的两倍。从人口分布看，1976年城市人口赶上农村人口（各占一半），到1988年城市人口增长到70%，农村人口下降到30%。而且，随着现代化的启蒙，农民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这样，威权主义再难以利用农村来制衡城市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而城市的不稳定性却一点没有改变。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据韩国学者估算，80年代韩国城市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2左右，两极分化十分严重^[105]。

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力量空前强大。此前的民主运动主要是由反对派领袖领导、学生运动为主力，力量相对薄弱。而1986年开始的民主化浪潮中，工人与中产阶级也加入其中，力量极大增强。其实，韩国的工人运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与过去只关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这样的经济权利不同，现在还提出政治权利要求。一方面是因为独裁政府的长期打压让工人意识到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是民主派人士有意参与和引导工人运动。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是80年代民主化运动另一大特色。韩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具有保守性，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也对统治者的利益分配不满。按照国际通用的收入分布十分位法，占人口60%的中间收入阶层所占财富比例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保持在46-47%之间，而同时期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阶层则占有48%财富。也就是说，与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相比，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则相对滞后。因此，中产阶级普遍不支持全斗焕连任，支持民主人士的修宪斗争。

第四，保守势力的妥协与联合让民主过渡平稳进行。张勉政府的教训说明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片面追

求民主形式只会造成混乱。卢泰愚政府正是扮演了从威权到民主过渡的角色。卢泰愚先是利用自己执政党和军部势力代表的优势，赢得1987年大选；后与原先的反对派金泳三、金钟泌达成政治交易，促使保守三党实现合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卢泰愚用民主手腕确保重建权威，表明此时的政治精英知道该如何“玩”民主。

4 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

韩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工业化和民主化转型，一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励志明星”，其发展道路被誉为“东亚模式”。然而，在光环之下，一些社会顽疾和深层矛盾正日益显露，被金泳三称为“韩国病”。1997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韩国病”长期积聚的恶果。1998年，在韩国建国50周年之际，金大中总统提出“第二次建国运动”，立志根除“韩国病”，实现韩国的蜕变。但时至今日，韩国的国家建设仍尚未完成。

4.1 在经济方面，工业化的汉江模式现在成为经济升级和社会公平的障碍

一是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引导发展是韩国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这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初期阶段非常有效。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政府干预反而降低经济效率，催生腐败。二是“官治金融”。韩国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而大型银行又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一直以来，韩国政府追求高增长率，要求银行大量放贷，扩大投资，结果造成银行呆账坏账比例居高不下。三是外向性依赖严重。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于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和弥补国内市场狭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韩国一直采取低估币值、提高进口关税等政策。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要求韩国开放市场、放开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韩国的出口优势逐渐丧失。四是财阀无序扩张。在工业化时期，财阀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进行“章鱼式”的扩张，控制着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韩国财阀的负债率都很高。1997年韩国企业负债率达到335%，而财阀的负债率更高达518.9%，有的甚至在1000%以上。由于财阀之间相互渗透，一旦出现资不抵债，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诸多问题最终酿成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韩国经济一落千丈，增长率从6%骤降为-6%，人均GDP由1996年的13255美元下降到1998年8134美元。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IMF提出严苛的自由化改革方案。2002年韩国走出危机阴影，但自由化改革并未完成，财阀垄断、高负债等问题

仍然明显。

4.2 在政治方面,民主成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游戏

民主化之后,韩国政治出现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总统和议会选举投票率低,另一方面抗议示威这样的街头政治却有增无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韩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政党制度。政党本是利益集团参与国家权力的代表,但韩国的政党却成为政治领袖争取总统宝座的工具。西方的政党相对稳定,有固定的政治理念,有固定的选民基础,推举候选人竞争行政权力,支持本党政府。反观韩国,政治领袖为了赢得选举,可以随意组建、联合或分离政党。比如金大中为了参加1997年总统大选,组建新党。金大中共本是进步阵营的领袖,但为了赢得大选,他又与保守派领袖金钟泌合作。总统与执政党也是经常闹得不欢而散。卢武铉在当选总统后,因政见不合与自己的母党——新千年民主党分裂,另组新党。而新千年民主党本为进步政党,但为弹劾卢武铉又与保守党联合。韩国政党没有起到选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作用。

第二,市民社会发生分裂。韩国之所以能实现民主转型,就是存在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但在民主化后,市民社会却发生分裂。首先,工人运动与进步势力分裂。金大中、卢武铉这样的进步总统上台后,为了经济发展选择与财阀合作,无视工人诉求,甚至镇压工人运动。其次,中产阶级自身分裂。民主化之后,中产阶级撕裂为保守阵营与进步阵营,双方对立严重。再次,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成为一种时尚。遇有利益诉求,市民首先想到方式就是上街游行。结果市民社会分解成各个小的群体,削弱了影响力。比如,2008年为反对进口美国牛肉,首尔市民居然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烛光示威。

4.3 国家统一和收复主权遥遥无期是韩国国家建设最大缺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度边缘化的统一议题回归视野。韩国政府不再坚持以北方为敌手,而是开始视之为平等主体,开展对话。金大中和卢武铉推行更为亲北的“阳光政策”。然而,此时南北实力与国际环境已今非昔比。韩国的统一进程遭遇结构性困境。自1969年韩国经济超过朝鲜,双方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2014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朝鲜的43倍。同时,冷战的终结并没有改善朝鲜的安全环境。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存在给平壤很大的安全压力。在这种结构下,韩国的对话政策并不能消除朝鲜的安全疑虑。为此,朝鲜坚持

走核武开发路线。但朝鲜的核野心反过来又成为韩国接触统一政策的障碍。2006年以后,朝鲜接连进行了5次核试验,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制裁。韩国对朝政策也趋于强硬。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发生后,南北关系陷入紧张。

除了民族统一外,主权完整也是韩国国家建设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根据韩美防御协定,美国长期在韩国驻军。客观地说,驻韩美军为维护韩国安全、减轻韩国防务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韩国并不是“免费搭车”,而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不仅驻韩美军司令掌握着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而且驻韩美军享有高度的治外法权,驻韩美军侵犯平民的罪行经常逃脱法律的制裁。主权的缺失很容易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2002年两位女中学生被美军装甲车压死,但肇事者却免于罪责。这引起韩国大规模的反美示威,具有反美倾向的卢武铉趁机赢得大选。卢武铉一上台就着手收回韩军指挥权,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实现自主国防等。这引起美国的不满和国内保守势力的抵制。卢武铉的“脱美”尝试无果而终^{[11]64-69}。可见,韩国社会对于完全“脱美”还有分歧,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意味着短期内韩国还难以完全收回主权。

5 结论:对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认识

第一,国家的不完整限定了发展道路的选择。二战后很多亚非拉国家脱离殖民统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现代的国家政权。最基本的两个要求就是民族统一和主权独立。而韩国的国家政权在这两方面并不完整。美苏冷战与国内民族主义分裂造成国家分裂、同族相残的悲剧。韩国也不得不牺牲主权,紧紧依附美国。独特的国家构造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历史轨迹。政治上,反共仇北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进步左派遭受打压,保守右派不受制约,特别是军部势力独大,长期掌权。经济上,韩国只能依附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反而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经济腾飞。

第二,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三股力量相互制约、共同促进而成的。对于韩国经济的成功,最常见的是两种解释。一是将其归因于国家的积极干预;二是强调韩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但如果与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就会发现这两种解释都欠缺说服力。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强调国家干预,虽然建立起健全的工业体系,但却效率低下。而另一些拉美国家发

挥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却只能徘徊于初级产业,落入依附陷阱。其实,韩国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民族主义。欺凌落后的历史刺激韩国社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奋发图强、追赶先进的民族情绪,尤其是以青年军官、技术官僚和企业家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综合来看,韩国的经济发展是由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自由主义推动韩国参与自由贸易,可以抑制国家干预造成的经济低效,增加资本积累;而民族主义主张发展民族工业,避免经济被国际资本控制,陷入依附困境;而威权主义的强力干预则可避免民族主义矫枉过正,走上排外、封闭的发展道路。

第三,韩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与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特性密切相关。韩国早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原则并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此后的40年里,却是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实。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还相对简单:精英阶层中保守势力异常强大;城市中间阶层尚未形成;底层仍是以农民为主,工人力量弱小且政治意识还没觉醒。直到80年代才形成足以支撑起民主的多元社会结构。另外,西方民主制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很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弱化,政策难以执行。西方国家也是经过长期的摸索,才形成一些无形共识,来维持民主形式与国家权威的平衡。韩国虽然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国家权力的运行还要靠威权主义实现。时至今日,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韩国政治。

参考文献:

[1]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v.2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 姜万吉. 韩国现代史[M]. 陈文寿,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3]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毛俊杰,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4] 朴正熙. 我们国家的道路[M]. 陈琦伟,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5]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6] 曹中屏, 张琏瑰, 等. 当代韩国史: 1945-2000[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 [7]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M]. 郭熙保, 王松茂,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8]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1. 1984.
- [9]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10] Kookshin Ahn. Trends in and Determinan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Korea [J].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2. 1997..
- [11] 许亮. 解析卢武铉主义[J]. 东北亚论坛, 2007(4).

责任编辑 朱文婷